

克勞塞維茨軍事啟蒙思想及其 其未完成理論之可欲性*

李黎明**

- 一、前言
- 二、問題意識
- 三、啟蒙與反啟蒙的哲學分界：Isaiah Berlin 的觀點
- 四、對克氏定位的兩種極端觀點
- 五、過渡與中間屬性的定位
- 六、辨正與分析
- 七、結論：《戰爭論》理論建構的可能方向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為一本「未完成的」著作，是受到十八世紀啟蒙與反啟蒙兩種思想衝擊影響下的著作。就普遍性理論建構可欲性的方法論意義而言，克氏欲建構戰爭理論的終極目標能否達成？學界極少關注。甚至，對克氏思想的定位，亦呈含混不明且有分歧的現象，以致難以建立共識作進一步研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及編輯委員會的精闢指導與修正意見。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台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E-mail: li500042@ms23.hinet.net

投稿日期：2013年09月04日；接受刊登日期：2013年12月13日。

東吳政治學報/2013/第三十一卷第四期/頁 209-260。

究。

如果克氏的思想是反啟蒙屬性，則在理論上，他仍無法克服理念上的矛盾而建構理論；如果克氏的思想是啟蒙屬性，則他應該可以融合精神與物質兩種概念，最終達成建構普遍性戰爭理論的目標。因此，本文擬就克氏究屬啟蒙或反啟蒙思想定位分歧的現象，進行初步探討以釐清，最後嘗試指出克氏理論建構可能的方向。

本文採用 Isaiah Berlin 對反啟蒙的解釋觀點作為依據，對上述分歧的現象進行觀察分析。在論述架構上，除了前言與問題意識，首先陳述啟蒙與反啟蒙的哲學分界，以作為一種分析觀察的指標。其次討論學者對克氏思想在此分界上的三種定位。最後，就這些學者的觀點，提出定位分歧原因的綜合分析，並依此提出克氏理論建構可能性的前瞻思考方向。

關鍵詞：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啟蒙、反啟蒙

一、前言

就西方軍事理論而言，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以下簡稱克氏）的《戰爭論》（*On War*）無疑為眾所公認的經典著作，至今也無有超越其論述的宏旨者。雖然《戰爭論》迄今為止早已列為東西方當代學院派軍事教育的基本教材，然而該書畢竟為一本未完成的著作，百餘年來對於克氏著作的終極目標，就方法論與知識論的意義上究竟能否達成？內容又將會是甚麼形態？論者迄未能夠給予有創見性的結論。本文擬就長久以來論者對克氏軍事啓蒙思想定位的含混不明，進行力求詳盡的分析與釐清，最後則對《戰爭論》的理論建構提出一個可能的方向。本節將首先指出一般對《戰爭論》的誤解、誤用，以及對「未完成著作」的意義與期待。

歷來對《戰爭論》廣泛的研究文獻顯示，絕大部份係依據所需予以斷章取義，或就其內容詮釋引申以幫助閱讀與理解，而實際很少被做深入的研究（Echevarria, 2007: 196）。知名戰略學者Bernard Brodie（1910-1978）指稱「《戰爭論》內容雖然卷帙浩繁，但卻簡明而非專業術語的陳述」，Antulio J. Echevarria II認為，此乃對克氏思想最大的誤導。在Echevarria的看法，理解《戰爭論》是一項困難，且有時令人沮喪的工作，克氏的大部份觀念不僅不簡單，而且是錯綜複雜、相互關聯與含糊不清的，這顯示了克氏並非經常總是明確自己的立場，有時會意外及奇特的將讀者陷入矛盾的印象。其用詞偶爾嵌入當時的哲學術語，例如那些經常使用的象徵隱喻，幾乎使當代讀者無法理解，導致整體誤解的危險（Echevarria, 2007: 1）。

Walter Bryce Gallie (1912-1998) 1978 年的著作中指出,《戰爭論》為一本偉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但它是一項「未完成的」(unfinished)作品,內容包含著一些重要概念在基本原則上的矛盾,尤其是克氏在經歷多年努力之後,卻仍然未能發現其理論核心關鍵問題的解決方法。事實上,Hans Delbrück(1848-1929)、Raymond Aron (1905-1983) 等知名學者曾經給予高品質的研究,但在概念邏輯的混淆方面,仍然未能滿足真正哲學性的鑑賞與批判。因之,克氏的著作需要同情且嚴謹的給予重新解釋(Gallie, 1978: 4-6)。

依據克氏本人的說法,該書的論述內容以及寫作目標,存在著連克氏本人亦說不清楚的疑點。他在 1827、1830 年所記下的兩項筆記稱:「假使我不幸早死----則所留下的著作當然只能算是一大堆尚未成形的思想。那將會受到無窮的誤解,並成許多不成熟批評的目標。」(Clausewitz, 1993: 78)。¹

Aron 在 1978 年的著作中認為,如果克氏能夠活著完成修訂其《戰爭論》,他將會發展出一個解決衝突的理論(Strachan, 1992: 1035)。是否有此可能性?而其內涵又如何?Peter Paret (1924-) 認為,克氏在 1827 年決定修改文稿時,並無放棄其原有理論的意涵所指,其意義只是想對那些理論加以擴充與精煉(Paret, 1993: 5)。Michael Eliot Howard (1922-) 與 Paret 兩人在《戰爭論》英譯本前言中,暗示著《戰爭論》若能真正完成,將可能會作出有所發展(Howard and Paret, 1993: xvi)。雖然,這項潛藏的預期,在他們後續冗長陳述中並未具體而明確,相信讀者也未能獲得真正的理解。

但是,也有與此不同的看法。Azar Gat (1959-) 認為,克氏在

1. 本文撰寫時亦同時參考鈕先鍾譯。1980。《戰爭論》。台北:軍事譯粹社。為便查證原文,有關本書引證均以英譯本為準。

1827 年面臨追求歷史特殊性與普遍性兩種對立原則的張力，如果他不是死於 1831 年，而是活得更久，則很可能絕大部份推翻他原先已成形的觀念（Gat, 1989: 251）。

這樣不同的看法皆是基於對克氏所處的時代思想理念之差異而來，也就是十八、十九世紀持續之啓蒙思想與反啓蒙思想的差異觀點。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澄清與辨正那些享譽盛名學者對克氏思想究屬啓蒙或反啓蒙推論迥異的觀點，以免部份錯誤的推論成爲後續研究在信念上的阻礙。雖然它並不能絕對性的影響任何後人意欲「重建」戰爭理論的意圖，但從學術求真與文獻考證的角度來看，它應具有一定的基本意義。

二、問題意識

對一部未完成的經典著作進行其哲學思想的探討，就本文撰寫的目的而言究竟具有何種意義？

克氏理論延續或推翻的可能結果，如果研究者僅從克氏已表述的文本內容推論，實不可能超越克氏自身的侷限，因此可能須從影響克氏潛在思想的時代背景考量，亦即十八、十九世紀轉換之交啓蒙（Enlightenment）與反啓蒙（Counter-Enlightenment）兩種完全迥異的思想理念著眼。

的確有少部份論者，主張應從克氏的時代背景因素，亦即啓蒙與反啓蒙思想的考察，去解決克氏未完成著作的問題，然而事實上並未獲致任何結論。主要因爲沒有提出令人信服且具哲學意涵，至少是方法論或知識論的觀察指標與判準。

Echevarria 做了一個簡單提示，他指出，克氏未完成著作的重要意義，乃為後人將如何探索克氏著作的本意？甚至更需要改寫以完成《戰爭論》未完成的部份（Echevarria, 2007: 4, 191-196）。克氏著作的本意究係何指？探索工作的性質是甚麼？

Echevarria 視此為方法論的問題，他指出《戰爭論》經常被誤解，但是幾乎無人去探索克氏的方法論，以瞭解它是否可能增進我們對克氏概念的理解（Echevarria, 2007: 1）。Echevarria 著作的目標，旨在闡明《戰爭論》的意圖以及克氏意欲展現其概念的方法論，並運用此種知識做為基礎，以理解克氏對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戰略的原則，以及戰爭的普遍性理論（Echevarria, 2007: 2-3）。然而，從 Echevarria 的論述內容來看，他亦不過僅僅從一般概念而非方法論的層面，勾畫克氏關於戰爭的性質、戰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以及幾項主要的戰爭原則。

對克氏理論建構可欲性的推測，Gat 似乎強調一種不同一般的哲學思考途徑。他指出，包括了克氏在內的那些軍事思想家，在啓蒙運動與日耳曼運動時期，大量的呈現了他們對世界的理解與表述。然而，理論是處於多種變化挑戰下的因應發展而成，同時也是基於各自不同的洞察力、態度以及觀點的反應與表述。軍事理論的每一個概念的理論前提，不能不依賴於某種總體性的世界圖景。欲瞭解人們的觀念，實不能與他們所思考的問題，或者他們所反應運作的環境相分離（Gat, 1989: 254）。Gat 所稱的啓蒙運動與日耳曼運動，正是克氏所處當時代知識（intellect）趨勢的競爭時代。

Paret 也認為，基於某些特定證據，可以推論出，克氏的方法論甚至他的觀念，實際源自德國唯心主義（German idealism）哲學以及啓蒙後期的美學理論（late-Enlightenment aesthetic）（Paret, 1985:

150-151)。

就此而論，Alan Beyerchen (1948-) 的說法即更爲明確。他認爲，克氏與當時代受過教育的德國人一樣，虔信 Isaac Newton (1643-1727) 的理論，也都熱衷於由 Immanuel Kant (1724-1804) 體現的德國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Beyerchen, 1992: 59-90)。理解克氏思想的方式之一，即爲藉由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葉的科學與技術來分析他的觀念，引領我們進入克氏時代啓蒙與浪漫兩種戒律 (precepts) 之間的衝突 (Beyerchen, 2007: 45, 55)。

專業哲學家的觀點，足以做爲上述問題應予歸屬爲方法論性質的重要依據。Ernst Cassirer (1874-1945) 在 1932 的著作指出，「在千差萬別的啓蒙思想活動中，有一清晰可辨的中心出發點與歸宿，此即爲以理性功能的分析還原與理智重建的方法論工具。事實上，就是啓蒙哲學強烈反對十七世紀形而上學，反對從原理、原則、公理演繹出現象與事實，而主張從現象與事實上升到原理與原則」(卡西爾，1986：譯者前言頁 3-4)。

以上的觀點，顯然揭示了應從方法論或知識脈絡的途徑，亦即以啓蒙思想的時代背景，來理解克氏欲建構理論的意涵與重要性，雖然他們仍然沒有提出更清晰而一致的結論。事實上，從 1970 年代中期，包括 Aron、Paret、Howard 在內的幾位著名學者，已經從啓蒙的觀點，具原創意義的探討了克氏的著作與思想。然而，Gat 在 1989 年對前人著作廣泛徵引並在批判的基礎上亦提出了新的創見。Gat 指出，Paret 對克氏的研究名聞遐邇，但他仍未完全成功的定位 (positioned) 克氏真正的知識脈絡 (intellectual context)，以及克氏在 1827 年思維轉變對其理論發展的重要意義；Aron 則幾乎未察覺到克氏著作的時代文化脈絡 (cultural context) 以及克氏所表達的

時代知識趨勢 (intellectual trends) (Gat, 1989: 170)。Gat提出了啓蒙與反啓蒙思想更本質的知識的概念，更具體的說，是從「知識趨勢」、新知識典範 (new Intellectual Paradigm) 的觀點進行分析。他自稱他的此項論點，係試圖拒絕一般廣泛研究者「幼稚的」(naive) 軍事思想研究途徑 (Gat, 1989: 253-254)。

然而，軍事或政治學者的觀點，似乎並不易深入到哲學的專業領域去探討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在表述克氏或其他人關於啓蒙思想哲學性的內涵上，顯示了巨大的差異甚至謬誤。主要是他們在給克氏定位為啓蒙思想或反啓蒙思想的問題上，顯現了重大分歧。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兩種思想對普遍性理論存在與建構的可欲性，表現了截然不同的信念。Peter L. Thorslev (1929-2011) 於其 1993 年的著作認為，啓蒙的傳統是在尋求抽象概念以建立萬事萬物均可存在的普遍原理原則；但是，初期浪漫主義者，堅持將人視為歷史的具體現實，認為包括人類在內諸種有機事物抽象隱喻的理論建構，為不可能經由任何過程以達成，僅可經由直接的直觀以類推 (Thorslev, 2003: 87)。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啓蒙與反啓蒙的論戰，正是在此一理論建構方法論歧見的呈現。

對於戰爭理論建構的可欲性，當代學者的觀點也仍然執著於這兩種不同信念。其一認為，戰爭原則可以被發現，而且能置於一個科學體系之內，以作為軍事教育的入門 (Crevelde, 1991: 96)。這個觀念為啓蒙思想對建立戰爭科學可能性信念的產物，為建立於啓蒙思想因果觀念的科學知識 (Rasmussen, 2001: 6, 24)。從Echevarria的觀點來說，《戰爭論》也無可避免的在尋求普遍法則。他認為，克氏對Dietrich Heinrich Freiherr von Bülow (1757-1807) 批判的目的，正如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 創立日心說，以取代Ptolemy

(90-168) 地心說的理論建構意涵 (Echevarria, 2007: 3)。

其二，則為全然相異的觀點。Bruce Fleming 指出，戰爭是一個準科學，同時也是一個擲骰子博弈 (Fleming, 2004: 64)；理論家將會發覺克氏居於兩個世界之間，相信永恆存在事物的新古典主義，以及強調個人能力與人類情感的浪漫主義，但此種結合並未產生調和一致的思想 (Fleming, 2004: 73)。Fleming 認為《戰爭論》應該像詩歌一般講授，因它展現了人類社會內在的矛盾。《戰爭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它的偉大在於它的自相矛盾 (Fleming, 2004: 76)。這一種說法完全否定了可以建構某種理論的可欲性。的確，戰爭為政治的手段、絕對戰爭、逐步升高至極點的內在邏輯，這些概念對克氏已然帶來諸多迄未解決的困擾 (Chapman, 1979: 559-560)。此種不可能建立理論的觀點，正是十八世紀浪漫主義與反啓蒙思想信念的現代反射。

由上所述，克氏究係啓蒙思想抑或反啓蒙思想屬性的定位，就隱含了《戰爭論》究竟能否真正被科學地建構？或者只能繼續被視為一部充滿內在矛盾的浪漫小說，而可任由「幼稚的」研究者予斷章取義？本文的目的，即在於正視此種歧見的重要性，藉由哲學意義的分界，釐清此種歧見並予克氏正確的定位，以確定克氏理論建構目標的可欲性在方法論觀點上是否存在。在能夠獲致本文研究問題的結論的前提下，始有可能理出一個頭緒以理解《戰爭論》或戰爭理論其建構理論的可欲性。

綜而言之，克氏認為，對於包含人類精神等複雜因素在內的戰爭行為，不可能建構成一個普遍性理論。然而，窮其一生，他畢竟是在尋求一個普遍性戰爭理論的建立。易言之，在克氏看來，這是具有「可欲性」的工作，但卻未能覓得調和的方法以解決《戰爭論》

中充滿相互矛盾的觀念。此項理論最終能否建構？而又將是一種甚麼型態？克氏已然不能給予任何詮釋，必須後世學者的研究探索。自克氏之後，學者對《戰爭論》的著墨，大多只是就其充滿矛盾陳述文本的斷章取義，這並不能在最終的理論建構上提供啓示。某些學者則嘗試從克氏的思想背景，亦即啓蒙或反啓蒙的屬性定位上，來理解他的理論形成、意涵或完成建構的可能。然而，這些努力歷時已久，卻並未獲得具體的結果。甚至，他們對克氏思想的屬性定位，亦呈現完全相反的推論。十八世紀的反啓蒙思想，認為不可能建立人類行爲的普遍性理論，亦即不具理論建構的「可欲性」。若一意秉持此種信念，則不僅內容矛盾且屬尚未完成的《戰爭論》其內容不具意義，其後也不可能建立任何戰爭的理論。從克氏耗時的寫作以及最後仍欲徹底修改的明確意圖來看，克氏自然不是反啓蒙思想，這一點無須再從《戰爭論》的文本進行論證。

由於篇幅所限，亦由於事涉論述主題稍遠，有兩個顯著的範圍本文亦不涉及。其一，本文不探討關於啓蒙的本質意義與現代性意涵。例如，Kant在1784年著名的〈何謂啓蒙？〉（*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他視啓蒙為具有在各種領域範圍內公開使用理性的自由之意義，藉以走出只能歸諸於他自己的未成年的狀態，亦即在沒有監護人就無法使用自己思考能力的狀態（Kant, 1996: 58-64）；以至於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將啓蒙置於一個更高的哲學抽象意義，賦予一種「是否有所進步」的現代性意義（傅柯，1992：22-31）。軍事學者Graeme Garrard所論述的反啓蒙也不是一個單一的運動，其範圍比啓蒙運動更廣泛與深入，包括了十八世紀以至於現在，因此其論述也集中在啓蒙運動及其缺點的問題（Seidman, 1983: 3, 10）。這類論述啓蒙價值的探討，

必然超越歷史，而呈現了其非歷史性或者人類經驗永恆性的面向（Lilla, 2003: 10）。這類的論述文獻，顯然遠遠超過十八世紀啓蒙與反啓蒙的分界問題，並無助於我們對克氏當時代的背景理解與分析，因此非本文所欲探討的範圍。

其二，本文不作《戰爭論》文本內對克氏思想屬性的詳細探討。本文僅引用其明確且扼要的結論，來揭示克氏追求理論建構的一貫意圖。本文主要的論證範圍，乃在於對持異議者的批判觀點上，來釐清克氏的思想定位。

軍事與政治領域的研究囿於其狹窄的範圍，尤其在探討跨哲學領域的問題時，可能需要借用哲學也許僅僅是粗淺的某些知識。本文試從此一方向，引用某些關於啓蒙或反啓蒙思想的哲學文獻，主要是關於界定兩者分際的方面，以此做爲對那些分歧觀點的分析依據。因此，就方法論而言，本文採用 Isaiah Berlin（1909-1997）對啓蒙與反啓蒙兩種不同思想在基本信念上的區分，主要是指理論建構的可欲性觀念的陳述。本文嘗試以他的解釋觀點，對啓蒙與反啓蒙的界定進行比較分析，以期獲致對理論建構的可欲性結論。易言之，本文的論述假設命題即爲：如果克氏的理念是反啓蒙屬性，則在理論上（克氏能夠再多活兩年，或假後人之手），他最終仍無法克服矛盾而建構一普遍性的戰爭理論；反之，如果克氏的理念是啓蒙屬性，則在理論上（假設條件如前），他應該可以融合精神與物質兩種概念，最終達成建構一普遍性戰爭理論的目標。

在論述架構上，除了前述前言與問題意識之後，本文首先將討論啓蒙與反啓蒙的哲學分界，以做爲一種分析觀察的依據指標。其次，以 Berlin 的定義作爲分界的指標，進行對克氏思想幾種不同定位的觀察分析。再次，對這種定位分歧的原因作出綜合分析，最後，

提出克氏理論建構可能性的前瞻思考方向，作為本文的結論。

三、啟蒙與反啟蒙的哲學分界： Isaiah Berlin 的觀點

學者對於啟蒙運動的研究常以啟蒙與反啟蒙思想作為探討的議題，歸結其間的差異或是分界。這樣的哲學論述以 Berlin 為綜其大成的思想家，提出能否建構人類行為普遍性理論為依據，本文藉此論述克氏在此分界或差異上的定位。

(一) 視為一種過渡

德國哲學家 Ernst Cassirer 在 1932 年寫作的《啟蒙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一書，² 對啟蒙的意義給過界定，他指出啟蒙運動是要求經由內在動力而能自由發揮的哲學，以來發現現實問題的基本形式，包括實際存在著的物理與精神現象的一切形式（卡西爾，1988：作者序 3）。這一項著名的經典啟蒙著作，首次提到物理與精神兩種對立因素的思維。然而，他並沒有對反啟蒙作出同等份量或最低程度的進一步陳述。

美國歷史學家 Peter Gay（1923-），在 1969 年出版著名的《歐洲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中指出：十八世紀從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到 Kant 的啟蒙哲學家，可以劃分為三個世代，但他們之間所持基礎觀念並無顯著改變（蓋

2. Cassirer, Ernst. 1955. Fritz C.A. Koelln and James P. Pettegrove.trans.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Boston, MA.: Beacon.

伊，1992：282-284、289）；他們之中有左翼、有右翼，他們的聚集，無非是尋求提高或增加其個人聲望的策略（蓋伊，1992：271、273、275）；包括Denis Diderot（1713-1784）、Voltaire（1694-1778）、David Hume（1711-1776）、Kant，所有這些著作，無不屬於啓蒙運動的核心著作。若將他們視爲浪漫主義的先聲，是竊盜行徑似的界說（蓋伊，1992：270、277）；Kant雖然讚揚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大膽且自由自在的想像，但卻嚴厲批評他與玄學無異，乃係對科學方法感到失望之際轉而求之於詩歌。Kant認爲，哲學的任務在於修整，而不是培養想像的華麗之樹。Gay認爲，Kant是在維護科學以對抗想像（蓋伊，1993：100）。Gay主要對啓蒙運動作出詳盡的描述，但從他的說法中，可以區別啓蒙與反啓蒙的界線，在於科學與想像之間的差異。同時，即使在啓蒙哲學家之間，也有理念上不同程度的差異，然而，他們畢竟仍屬啓蒙的家族。

沿著這個思路，2006年，以色列學者Zeev Sternhell（1935-）對反啓蒙運動（anti-Enlightenment）提出嚴厲批判。在法國另一位學者Tzvetan Todorov則爲捍衛啓蒙思想起而論戰。Garrard認爲Sternhell的觀點，只是一個初步的啓蒙單純的對立於一個初步的反啓蒙（anti-Enlightenment），而沒有啓蒙與反啓蒙（Counter-Enlightenments）兩種極端之間的互動。此項觀點過於簡化與偏激，忽略了從啓蒙到反啓蒙的灰色地帶，沒有中間立場（middle ground）的考量（Garrard, 2011: 277-286）。

以上觀點的提示，雖然揭示了啓蒙與反啓蒙在本質意義上的差異，然而他們尚未作出更深入的闡述，由此彰顯了啓蒙與反啓蒙、以及屬於兩者之間的過渡觀念在本質差異探討上的重要性。

(二) 作為指標意義的分界

由上觀之，Berlin的著作就具有重要意義。他主要是將反啓蒙與啓蒙之間的區隔闡釋得極爲詳細，而且明確而一再的強調兩者在理念上的差異內涵。雖然，他並非第一個使用“counter-Enlightenment”此一名詞概念的人。³

1970年代以來，第一個對反啓蒙思想提出辯護的，是著名的哲學家Berlin在1973年名爲〈反啓蒙運動〉（“The Counter-Enlightenment”）的經典文章，對啓蒙與反啓蒙的論述，眾所公認，且被收錄於1973年版《觀念史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在Berlin的觀念中，十七世紀持科學理念理性主義者，他們相信存在著「建立於觀察實驗數據，經由邏輯演繹而得出的一組單一的、可驗證的嚴密體系」、「如此可以建立一個包羅萬象、能夠解答一切問題的單一知識體系。」然而，這種科學主義的信念，被Jean Bodin（1530–1596）、Montesquieu、Hume等思想家進一步的動搖。他們指出人類社會的多樣性，使得適合所有情況的普遍公理並不在。這一類的思想家，尚包括如 Voltaire、Jean-Baptiste le Rond

3. 關於“counter-Enlightenment”此一英文名詞概念的緣起，並非Berlin。事實上，William Barratt在1949年第一次使用了“counter-Enlightenment”的概念，參見其1958年出版的“Art, Aristocracy and Reason,” *Partisan Review*, 16(6): 663-664。除此，Sternhell在1962年出版的文獻中也不正確的使用過，參見Barrett, William. 1962.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p. 274。以上，引自Sternhell, Zeev. 2010. David Maisel, trans. *The Anti-Enlightenment Tra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446。參見Wokler, Robert. 2003. “Isaiah Berlin's enlightenment and Counter-Enlightenment.” in Joseph Mali and Robert Wokler. ed. *Isaiah Berlin's Counter-Enlightenment*. Philadelphia, P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 13.

d'Alembert (1717 – 1783) 以及 Antoine Nicolas, 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 等人。然而，上述這些十七、十八世紀的啓蒙思想家，雖然有著若干理念上的差距，但也存在著廣泛的一致。他們仍保留著一種共同的核心 (common core)，他們相信存在著一組普遍而不變的原則支配世界 (One set of universal and unalterable principles governed the world)。這些規律既支配著自然世界，也支配著人類社會。這些規律是麼、如何發現它們，或許存有歧見，但這些規律是真實的，是可以獲知的。Berlin認為這個信念，仍然是整個啓蒙運動的中心信條。依Berlin的說法，反啓蒙就是對上述這種主導信仰體系最可怕的反對與攻擊。就如Herder的觀念，世界存在著多樣的且不可通約的 (incommensurable) 事象。反啓蒙的思想家們，從GiambattistaVico (1668-1774) 開始撼動了啓蒙運動的支架，Johann Georg Hamann (1730—1788) 繼之對其摧毀 (Berlin, 1973: 100-102)。

反啓蒙思想家認為所有的真理都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真理需要創新、天才、直接的表露，這是分析科學無法做到的。在 Berlin 看來，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 提出「分解就是謀殺」這句浪漫主義的名言，就是那些反理性主義的思想家之父 (Berlin, 1973: 103-104)。

依據Berlin的陳述，可以歸納啓蒙運動的信條 (doctrine) 為：能夠提供技術手段而為規則，能夠發現人的真正需要；啓蒙運動的中心信條為：人們在生活行動和創造時所應遵循的原則，是先天確定的，且受自然的主宰；啓蒙運動的中心原則 (central principles) 為：普遍性、客觀性、穩性，對一切真實問題提供了永恆解決的能力與可以被掌握的理性方法。然而，Berlin對反啓蒙的

思想，描述為：認為一切規則或戒律（precepts）即為消亡，若遵循它們，就永遠成不了大業。由是，那些啓蒙運動的核心觀點，被反啓蒙者目空一切的反對，也由此從實踐和理論上被否定（Berlin, 1973: 105-109）。

Berlin的闡述，正是對十八世紀啓蒙與反啓蒙思想在基本信條或核心觀點上所呈現差異的指標性描述。從Berlin那裡可以覺察出，從啓蒙到反啓蒙者之間，有著三種類型的分界。Berlin的觀點，扼要的說：首先，啓蒙運動相信人類社會存在單一而完美目標的信念，將可以被發現且應予以追求。相對於此，反啓蒙信條則認為：對於人類社會，欲證明與陳述其具有單一完美的終極目標，此種企圖乃屬錯誤與極度危險之舉（Robertson, 2003: 73-74）。Berlin指出了兩者關鍵性的差別所在，實際屬於理論建構的方法論可能性問題。其次，在Berlin的看法裡，啓蒙與反啓蒙的分野，出自於其認知意識程度是否超出某個限度。易言之，持較少程度相對觀念或懷疑觀念去質疑十七世紀科學方法理性主義，而仍被歸類為啓蒙派的，大有人在，甚至包括Montesquieu與Voltaire等等被公認的主要啓蒙思想家。而這個分界指標或說「核心觀點」，就是建構普遍性理論的可欲性。而只有那些徹底否定及攻擊啓蒙「核心觀點」的人，⁴才被他視為是反啓蒙者。

(三) Berlin 思想的連貫性

如果將Berlin在1973年的陳述視為一種暫時性的結論，則後來

4. Berlin在該文中對於dogma, doctrine的用法並無明顯區分，意指多有重疊、互用之處。因此，本文一概使用「核心觀點」的譯法，惟在對應的部份仍將加註原文。

他對相對主義、多元主義，以及歷史主義的闡述，就是進一步在不同層次方面的深化解釋。後者更具體的闡述了反啓蒙運動的思想信念。

關於相對主義，Berlin的觀點是，無論何種形式的相對主義都堅持客觀的價值是不存在的，否認價值本身所具有的終極意義。因此，相對主義者只做事實描述，並因而否定對這些觀念作出對或錯的判斷之可能（王敏、馬德普，2012：7-12）。不言可喻，相對主義否定了普遍性原理原則存在的可能性。

多元主義或者「一與多」（“the one and the many”）的論述，為Berlin主要宣揚的論題之一。事實上，柏拉圖從現象的「多」追溯到原因的「一」，認為個體物必須是一才能存在和被認識。一本身是事物的原根據，給予一切存在者以規律性。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因為它使一作為多的形式、目的等本質結構，因此內在於多當中，使得一作為多的不可缺少的原則，在多當中本質性地存在著。這種古代真理觀，就是對統一性、對真理、對確定性的尋求（李華，2012：26-34）。Berlin批評一元論以及對單一標準的信仰，經常被證明為「是滿足知識與情感的一個深刻的來源」（Berlin and Hardy, 2002: 216）。Berlin指出，那些理性主義的啓蒙運動者，他們相信一個單一和諧的統一體中所有的人類價值能相互協調，這正將導致可能存在的危險幻想（Berlin, 1990a: 15）。啓蒙運動所堅持的這種一元論信仰，終究要為屠殺個人而負責。而反啓蒙運動，則助長了反理智的激進主義潮流形成了價值多元主義（Berlin, 1979: 333）。Berlin指出，多元價值不可能被安排在一種永恆不變的等級秩序之下，或者是用某種絕對的標準來評判（Berlin, 1990b: 79）。多元主義提出價值「不可通約」的主張，說明了人類理性在指導人類行動方面並非萬能（鄧春梅，2012：49-53）。更具體的說，多元

價值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通約的，這就在基本上，否定了對永恆規律追求的前提（韓曉賀，2012：58-59）。Berlin的多元論，就是認為對於「不同」來說，它們之間是不可通約的，或者說是理性所無法比較的。若此，則我們唯一依賴的只能是無根的決定，只能是人類的信仰，而不是反省式的思索或理性（格雷，1999：125-145）。Berlin的哲學多元主義對多樣變化的頌揚，對多樣性與差異的強調，明顯的出現在反啓蒙思想家的觀念之中（Mali and Wokler, 2003:xi）。

Berlin的價值多元論，自然也包含了歷史主義（Berlin and Hardy, 2002: 172），宜應置於一個脈絡之中來討論。歷史主義，是對古典自然法的反對。德國歷史主義反對啓蒙運動宣揚的，適合於一切時代、歷史和民族的抽象的普遍理性和人性假設（施密特編，2005：328）。歷史主義的核心，是用個體化的考察來代替對歷史—人類力量的普遍化的觀察（宋友文，2012：55-61）。在歷史主義者看來，自然權利論主張有一套普遍的、抽象的原則和規範，這一秩序無需考慮特殊的時空條件，應該且能夠在任何時空中被建立起來。歷史主義否定任何普遍的抽象的價值規範，承認所有的價值規範都是在某一歷史環境的背景下產生的，因而都是獨特的（伊格爾斯，2006：6、46）。從歷史主義的觀點來看，不可能建立普遍原理原則或放諸四海皆準的一般性理論。

綜觀以上的陳述，總結而言，Berlin的反啓蒙界定，乃基於不可通約的觀點，否定一切普遍原理原則建立的可能性。至於十八、十九世紀之交，那些居於批判啓蒙的立場，但仍然堅信普遍理論可能性的人，則仍然屬於啓蒙思想的陣營。於此觀之，啓蒙與反啓蒙的分界，不在於是否批判啓蒙的主張，而是認為關於人類行爲的普遍性理論是否能夠建構。其關鍵因素，在於人類行爲的獨特性或不

可通約性。以下兩節，即以此項指標，觀察分析那些對克氏啓蒙屬性定位的兩種極端推論以及中間過渡的看法。

四、對克氏定位的兩種極端觀點

克氏在啓蒙與反啓蒙思想的分界或差異上，學者之間存有不同的定位，有屬啓蒙有屬反啓蒙，各有其論述依據。也使克氏的面貌更爲模糊難識。

(一) 啓蒙屬性的定位

克氏的《戰爭論》出版以來已經超過 180 年之久，甚且以其經典地位與迄今仍爲學院派軍事教育的重要性而言，對克氏軍事啓蒙思想屬性的看法，卻仍然呈現對其屬性兩極看法的現象。

將克氏定位爲純粹啓蒙思想屬性的論者，據可獲悉的文獻觀察，僅見於 Amos Perlmutter (1932-2001) 於 1988 年刊登於《戰略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的一篇論文。Perlmutter 將克氏與 Montesquieu、d'Alembert、Fontenelle (1657-1757) 以及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 這些當時代的啓蒙大師並列排名，稱克氏爲啓蒙哲學家 (Perlmutter, 1988: 7)。Perlmutter 論證的依據是：克氏的《戰爭論》與那些啓蒙思想家的著作，在寫作目的、方法、思維或結構等等不一的問題上類似。舉一個例子：Perlmutter 認爲，克氏的理論框架，爲戰爭手段之間的關係與戰爭類型的分類；而 Montesquieu 的理論框架，則爲政府結構之間的關係與政府類型的分類。此外，克氏對法則的觀點，亦完全直接取自 Montesquieu 的論點 (Perlmutter, 1988: 8-13)。顯然，Perlmutter 的

論點過於主觀，而且並非在哲學的抽象層面，至少遠離了啓蒙或反啓蒙思想本質的探討。

然而，Perlmutter 的原創性觀點，仍有後續研究的很多認同。他們認為，無論如何，迄今克氏仍然被廣泛的視為啓蒙思想的傳承者。克氏只不過是活在 Kant 式的，以及充滿 Goethe (1749-1832)、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 知識與語言的領域，並無人視他為一位詩人 (Cooper, 2007: 80-81)。儘管克氏批判 Henry Humphrey Evans Lloyd (1718-1783)、Bülow 那些軍事啓蒙理論家，但他仍然借用了他們的觀念與歷史案例 (Echevarria, 2007: 17)。除了歷史研究與個人經驗，克氏的觀點亦受通俗文學 (popular literature) 以及當時哲學辯論的影響。他主要得助於啓蒙特別是 Kant 知識的教養，少部份得自浪漫主義的知識 (Echevarria, 2007: 118)。關於天才的觀念，亦非受到德國反啓蒙運動以及浪漫主義運動的極端非理性主義之影響 (Echevarria, 2007: 111-112)。在摩擦、三位一體，以及克氏其他等概念方面，Christopher Bassford (1953-) 認為，其作品亦內含非常多的啓蒙精神 (Bassford, 2007: 78-79)。

(二) 反啓蒙屬性的定位

相對的，定位克氏為反啓蒙思想的論述則為數不少，而且出現在若干知名的原創性著作之中。

軍事反啓蒙思想的出現，一般認為源於 1730 年 Jean-Charles Chevalier de Follard (1669-1752) 的觀點：「戰爭為一種無知的行業，也是一種專家的科學」。更具體的則是 1932 年寫作、直到去世才在 1956 年出版的 Maurice de Saxe (1696-1750) 元帥的觀點：「戰爭為在陰影遮蓋下的科學，在隱晦中沒有確證的行為步驟。戰爭的

基礎與支持，乃係茫然無知中的常規與偏見。所有的科學均有原理與規則，戰爭則無」（Saxe,1985: 202,189）。

Howard在其 1970 年的著作指出：十八世紀中葉，就戰爭實踐的知識領域，與所有其他科學一樣，同樣在努力追求突破傳統偏見，從而等待像Montesquieu與Newton這樣人物的出現。持有這種抱負的人卻有兩類不同的看法：一類是法國的de Saxe元帥與de Guibert（1743-1790）將軍，在他們的作品中，並無戰爭原則的出現；另一類，則是Lloyd的觀點。Lloyd指出，軍事藝術有兩個部份，其一是可以學習的機械部份，另一是無法習而得知的應用部份（Howard, 1970: 22-23）。Howard認為，在Lloyd之後，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軍事思想，但均可以追溯Lloyd為其祖師：其一，是試圖以地理與後勤的資料為基礎以來建立不變的戰略原則，由Bülow所代表。他提出了數學與幾何公式作為戰爭的簡化規律與原則；其二，則是強調戰爭中的政治與士氣因素，且無法以精密科學來處理，由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1733-1814）所代表。Howard指出，在當時狂飆運動（Sturm und Drang; Storm and Stress）盛行之際，身為浪漫派宣揚者（standard bearer）的Berenhorst認為，不可能有科學分析的戰爭原則。「十九世紀開始，即為此兩種極端對立觀點的辯論，每一位軍事理論家都希望對此兩種觀點尋求解答。不久，繼Bülow與Berenhorst之後，又被兩位更具影響力的人所取代」，前者為Antoine Henri Jomini(1779-1869)，後者則為克勞塞維茨(Howard, 1970: 25-26)。

從 Howard 的陳述，可以明確看出 Berenhorst 的浪漫主義信念，而又稱克氏為 Berenhorst 理念的承繼者。尤有進者，Howard 更明確的指稱：「克氏對意志的強調，與十九世紀中葉的浪漫主義，以及

其對戰鬥的強調又與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均相吻合」（Howard, 1970: 30-31）。Howard 對浪漫主義的意涵，沒有更進一步的說明，也沒有使用「啓蒙」或「反啓蒙」的名詞概念，我們無法確切的辨別 Howard 所稱的浪漫主義是否就是反啓蒙思想。然而，Howard 明確指出 Berenhorst 否認存在科學分析的戰爭原則，而後者被 Aron、Gat 以及絕大部份學者定位為反啓蒙，殆無疑義。因此，依據 Howard 陳述的邏輯，直覺的令人感到他係定位克氏為反啓蒙思想。

Hew Strachan 則在 1983 以及 2007 的著作中認為：正如狂飆運動的作品一樣，克氏著作亦建立於啓蒙思想的基礎，但可以看出克氏並非完全同意任何事情均被理性所影響；克氏作品堪稱為「德國浪漫主義之花」（a flower of German Romanticism）。克氏受 Kant 的影響是清晰的，但並不那麼深刻。兩人的著作，《戰爭論》與《永久和平》幾乎並不相容。克氏著作的門徑，更容易令人聯想到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哲學。《戰爭論》的內容包含了感情與不可知因素，同時也涉及到個人觀察、歷史的解釋以及思維的推理（Strachan, 1983: 90-91）。

Strachan 在 1983 年的著作，並未多談浪漫主義。Strachan 雖然直稱克氏的《戰爭論》為浪漫主義之花，但其著作中，隻字未提 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或 Goethe 對克氏的影響。然而，他在 2007 年的著作中，就比較清晰，指出克氏早期受到啓蒙作品的啓發（Strachan, 2007: 19）。然而，標誌著對法國啓蒙運動回響的德國狂飆運動，最終滲透成為浪漫主義，而克氏正逢此一運動在德國的發展，克氏關於軍事天才的陳述，強調個人在人生奮鬥中的能力，係受到 Kant 同時也是浪漫主義的主要影響（Strachan, 2007: 40）。從 Strachan 2007 年的陳述，可以看出他所指的浪漫主義並非模糊的

過渡意義，實即明確定位克氏為反啓蒙的浪漫主義者。

享有國內首位戰略思想家盛名的鈕先鍾先生在 1995 年的《西方戰略思想史》為對此一領域研究的中文鉅作。雖然，該書的論述主要係就軍事歷史文獻的觀察分析，加以作者本人推論後的結論。然而由於他的著作早已影響及於兩岸廣大華人學術社群，因此他的觀點有必要在此提及。鈕先鍾在該書第十章〈克勞塞維茨〉的第一節，即以「啓明的反動」為標題，予克氏反啓蒙的思想定位。

觀察鈕先鍾論述的依據，主要是爰引 Howard 與 Paret 的著作，以及一般的哲學簡介專書（鈕先鍾，1995：179-180），由此作出自己的推論。他指出：「...由於 Berenhorst 的發難，啓明學派的絕對權威開始動搖。接著在幾年之後，克勞塞維茨即異軍突起，在軍事思想領域中開啓古所未有的新境界...」（鈕先鍾，1995：236）、「首先在此領域中發動新反啓明運動的人即為 Berenhorst，...」（鈕先鍾，1995：238）、「Berenhorst 在思想上可以算是克勞塞維茨的前輩，但對他似乎只有間接的影響而無直接的影響。對克勞塞維茨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是 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鈕先鍾，1995：239）、「Scharnhorst 不特不反啓明，而且更代表啓明的正統。...對於此種立場，克勞塞維茨也深表贊同。」、「...克勞塞維茨的全部理論又都是以 Scharnhorst 所已發展的架構為基礎。」、「不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克勞塞維茨的思想體系雖發源於其師，但其氣象的雄偉，分析的深入，又遠非其師所能及」（鈕先鍾，1995：241）。鈕先鍾最後寫道：「...誠如 Paret 所云，構成他與 Scharnhorst 在觀點上的顯著差異。老師為啓明學派的末代傳人，而弟子則為反啓明學派的開山大師」（鈕先鍾，1995：251）。

觀察以上兩種極端定位觀點的推論依據，論者無非從：《戰爭

論》在寫作目的、方法、思維或結構上受到何種思想的影響；對理性或精神因素的偏好傾向；浪漫主義做為時代背景必然影響的結果；或者就軍事歷史文獻的觀察分析，加以作者本人推論後的結論。這又可以概略分類如下：第一類，將克氏定位為啓蒙思想的學者，多係從克氏所處啓蒙時代的思想特徵，主觀偏好的認為他是啓蒙思想傾向，而並非從啓蒙與反啓蒙思想的差異作出區分與推論結果。第二類，將克氏定位為反啓蒙思想的學者，則是過於強調克氏受到浪漫主義與反啓蒙思想陣營的影響，而在著作中呈現若干反啓蒙的觀點，而忽略了他仍然保有啓蒙觀點的那些部份。雖然，第二類論點就思想內涵作出比較深入的陳述，也顯現了理論建構可欲性的意義，但卻並非依據 Berlin 清晰的基本信念或核心信條的分界原則。簡言之，這兩類觀點，均屬主觀而偏頗。

五、過渡與中間屬性的定位

除了將克氏定位於非啓蒙即反啓蒙的極端立場外，另有學者則將克氏思想視為啓蒙與反啓蒙之間的過渡或中間屬性，例如 Aron, Paret, Gat, Lebow 等等學者，分從不同觀點而呈現克氏的定位。

(一) Aron：際遇與矛盾心理

Aron在1972年的著作，從理性，激情和力量的關係探討《戰爭論》的哲學內涵（Aron, 1972: 601）。Aron認為，克氏代表了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啓蒙運動和浪漫主義與歷史主義（historicism）在19世紀前葉之間的過渡，他的思想是搖擺於啓蒙理性主義與德國浪漫主義之間（Aron, 1972: 602、614）。1976年，Aron視克氏為戰

爭哲學家的性質，在另一項著作中進一步闡釋。他指出，克氏的身處情境是很難令人想像的，其一生處境充滿際遇與矛盾。例如，職業軍官與浪漫主義的角色、政治的理想與現實、體制的改革者與反動者、理念追求的有機性與物理性等等的矛盾與衝突（Aron, 1983: 40）。

在論述克氏傾向於啓蒙理性主義方面，Aron 提出他的觀點。他指出克氏反對啓蒙理性主義的傾向以及思維的簡約路線，認為戰爭藝術不可能縮減為一個成本與報酬的計算，而此種觀點正是浪漫主義所堅持。因此，他是深陷在 Berenhorst 的懷疑論與 Bülow 的偽科學（false science）之間。然而，克氏雖然駁斥 Bülow 的偽科學，但並沒有認同 Berenhorst 的懷疑論（Aron, 1983: 47）。Aron 認為，一般闡述者總是看到克氏與 Bülow 兩人之間在理論觀點上的差異。然而，在面臨懷疑論者 Berenhorst 批判的立場上，他們兩人都是一致的在肯定有一個可以重建知識大廈的科學規律。克氏自己也承認，在某個時期，他也屬於眾多 Bülow 理論信徒之一（Aron, 1983: 43）。克氏在評論知識份子對同情革命的錯誤之際，同時也肯定著源自於啓蒙理性主義的哲學（Aron, 1983: 34）。

另一方面，Aron 認為克氏也受到浪漫主義的影響。Aron 認為，即使克氏與啓蒙思想家 Montesquieu 的著作在分析的問題與方法上有若干類似，但卻不認為後者對克氏的影響很重要。Aron 更感興趣的是，克氏在《戰爭論》中對戰爭的性質、精神，與抽象目標的決心等等概念，並不同於當時主流啓蒙思想的觀點。雖然其後期觀點並不如其早期著作那麼明顯，Aron 認為這可能是對立觀點的交互作用使然（Aron, 1983: 232）。此外，克氏在《戰爭論》中已然提出了有關「絕對戰爭」的一連串相關概念。Aron 指出，這些用詞從來沒有被正確的譯成當時代的哲學語言，也未被提及是關聯到

Fichte、Kant，或 Hegel 的影響（Aron, 1983: 265）。

Aron 對於克氏兼具兩種極端傾向、矛盾現象並存的具體描述，從而對克氏思想作出過渡與搖擺的定位。

(二) Paret：典型知識份子的教養

Paret在 1976 年的著作，*Clausewitz and the State: The Man, His Theories and His Times*對克氏一生作出相當完整的描述，尤其是關於克氏寫作的心理與歷史根源（Paret, 1985: v-vii）。Paret指出，克氏的少年時代完全受到啓蒙思想的教育。克氏雖未明說求學時代讀過啓蒙思想的著作，然而，當時宣揚啓蒙思想的光明會（*Illumatini*）、共濟會（*Freemasonry*）曾經大量提供啓蒙思想讀物予流動圖書館。1770 年代「啓蒙後期」時期的教育理念，也已普及到普魯士的體制內學校，隨後也影響到了軍事小學。政府且明令宣示，為達到「真正啓蒙」的利益，小學的教育實僅限於此一目標之達成。足以說明，當時青年學子接受啓蒙思想教育的普遍情形（Paret, 1985:39,47,49）。

克氏思想的轉折，出現在世紀轉換之際，德國的浪漫唯心論（*romantic idealism*）的巨大運動主導著德國的知識生活（*intellectual life*），克氏在當時的立場，是很容易識別的。克氏拒絕當時普遍流行具有教條主義精神的啓蒙（*popular Enlightenment*），而一心追求不會受到限制的對人的理解。他極其獲益自早期浪漫主義強調對個人品質解放的觀點。但克氏仍未真正跟隨Novalis（1772-1801）與Friedrich von Schlegel兄弟⁵對情感投降的浪漫主義，特別是那些宗

5. Schlegel 兩兄弟：August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67~1845 為兄，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 是弟。

教情懷的神祕主義、鄉愁、國家家長制等等觀念。在感情與態度上，克氏更爲接近那些經歷日耳曼狂飆運動的反理性主義者，他們尋求內外的和諧，表達出對所有生物有機結構現象的單一性（unity）信念（Paret, 1985: 149）。

Paret 認爲，無論從何種角度看，克氏都不是一位受過訓練的哲學家，沒有證據說他讀過 Kant 批判哲學、任何一項 Fichte 的著作，即使讀過，也不能保證他的領悟超過當時任何一位著名的浪漫主義作家。克氏是當時典型的知識份子，僅僅受到啓蒙思想大環境第二或第三手資料的影響。實即，克氏思想的形成與延續，深受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之影響（Paret, 1985: 370）。

Paret 雖然並無提及中間屬性的概念，但是清楚說明了克氏在啓蒙、浪漫主義、唯心主義之間扮演的角色轉變，事實上可能暗指了克氏思想的中間屬性意義，至少認爲克氏不是一位純粹的啓蒙思想或浪漫主義者。

(三) Gat：知識趨勢

Gat 在 Aron 與 Paret 等前述研究做爲基礎的 1989 年著作中，強調知識典範（Intellectual Paradigm）的分析概念，他從反啓蒙與日爾曼運動（German Movement）兩個概念，著手分析克氏思想的本質（Gat, 1989: ix）。就某種程度而言，其著作亦有一定意義的原創性。

Gat 將當時代軍事啓蒙與反啓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作出一個描述性的比較。他認爲：Bülow 將啓蒙軍事戰略理論觀點的極端陳述，與軍事與政治激進主義，兩者併合；Archduke Charles（1771-1847）將啓蒙的理論觀點，與法國舊制度時期到拿破崙時期軍事政治戰略，作出保守的調適；Jomini 綜合了啓蒙思想遺產與拿破崙戰爭經

驗，發展出一組符合時代、可信的，以及相當成功的作戰基本原理；Berenhorst 表達了反啓蒙的觀點，並對 Frederick the Great（1740-1786）的政治與軍事體系進行了嚴厲的批判；Scharnhorst 融合了德國啓蒙運動的經典觀念，與改革者的政治與軍事觀點；克氏則併合了軍事與政治改革主義與日耳曼運動以及毀滅性的拿破崙戰爭結局（Gat, 1989: 94）。依據 Gat 的觀點，「反啓蒙」與「日耳曼運動」兩種概念可以代表當時新的知識趨勢（intellectual trends）。新的知識趨勢（intellectual trends）對 Berenhorst 與克氏，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影響。前者是對反啓蒙的正統闡釋者，克氏則可能是對「日耳曼運動」最瞭解的人（Gat, 1989: 141）。

Gat 的觀點中，克氏視將才個人的偏好與特質為戰略的規律，與啓蒙軍事家顯然不同（Gat, 1989: 179）。之間的差異，在範圍、深度、本質上顯而易見，為政治對戰爭與戰略的強調（Gat, 1989: 168）。然而，Gat 也指出，Hamann 等人為浪漫主義新文化趨勢（cultural trends）的主要人物，Kant 給予他們重要的啓發，但是 Kant 在其批判哲學中仍然未失其對啓蒙中心信條的信仰。（Gat, 1989: 142）。實際上，Gat 認為日耳曼運動居於啓蒙與浪漫主義反啓蒙的中間過渡位置。在 Gat 的觀念中，克氏思想與啓蒙不同，但並不表示是浪漫主義或歷史主義的反啓蒙，克氏更接近浪漫主義的先驅運動—日耳曼狂飆運動—的精神。Strachan 即認為，在 Gat 的整體看法中，克氏發展與反駁前人的論題，實際上是同等的份量（Strachan, 1992: 1035-1036）。

(四) Lebow：尋求中間地帶

Richard Ned Lebow 於其 2003 年的著作中，使用「中間地帶」

(middle ground) 來解釋克氏思想的「知識轉型」(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Lebow 認為，克氏反對啓蒙的觀點，但是也同樣反對以 Berenhorst 爲代表的反啓蒙觀點，克氏在尋求一個中間地帶，並逐漸理解到戰爭爲跨立於科學與藝術之間的东西 (Lebow, 2003: 184)。Lebow 指出，克氏與那些許多德國反啓蒙主要人物，包括德國唯心主義者 Fichte、Hegel 的一些人爲友 (Lebow, 2003: 307)。克氏熟悉那些作家的作品，也與他們有過書信聯繫。但是，克氏並非哲學家，對 Kant 的二元論並未下過功夫，從《戰爭論》的文本，亦未顯現對二元論的陳述。Fichte 的鬥爭哲學 (Philosophy of striving) 之內，亦無《戰爭論》論述的物理形式成份 (Lebow, 2003: 185-186)。Lebow 認為，克氏只不過是拾取他所熟悉的他們著作中的那些二手資料，而此種證據呈現在他對戰爭兩極性的理解之中 (Lebow, 2003: 308)。

Lebow 指出，的確在很多方面，反啓蒙的觀念影響了克氏的思想與理論假設。但是，他也等份量的虧欠啓蒙。像 Kant 擁有啓蒙的巨大資產一樣，克勞塞維茨跨越了啓蒙運動和德國對它的反應。他終其一生的雄心抱負，就是經由對理性 (reason) 概念在歷史與心理學方面的運用，發展一套戰爭理論，而這是一項典型的啓蒙作品。他也承認，這樣的理論可能永遠不會使戰爭符合科學，也不能反映反啓蒙的觀點。但是，從更深層的意義而言，克勞塞維茨仍然對啓蒙保有信心。他援引了許多日耳曼運動哲學家們的概念，但是拆解了他們的抽象內容。他借用了他們探索的工具，來提供作爲對戰爭的邏輯分析，並超越純粹理性以探索人類行爲的潛在原因 (Lebow, 2003: 177-178)。

Lebow 認為，在克氏的內心中，也反應了對啓蒙與反啓蒙張力的猶豫未決。他分享了啓蒙對自由的理性力量，但他也承認反啓蒙批判的有效性。他期待理性與妥協一致的勝利，但同時也擔心精神因素終將證明具有更大的決定力量。相當簡潔的，Lebow 揭示了克氏對於這些哲學問題達成調和的無力現象（Lebow, 2003: 301）。

(五) Beyerchen：隱含的概念

同樣的觀點，但是 Beyerchen 用線性與非線性的概念，描述了克氏兼具啓蒙與浪漫主義的思想成份。他指出，一方面，克氏經常提及戰爭的任何事情都非常簡單，即使這種簡單的事情是困難的。克氏對重心（centre of gravity）概念中的多樣化（varieties）、戰爭動力法則（dynamic law of war）概念中的均衡（equilibrium）的注意，表明了 Newton 力學存在其信念之內。然而，克氏反對啓蒙強調將現象及其表述限制於線性的方法之內，這並非否定克氏對古典簡樸性的肯定（Beyerchen, 2007: 51）。另一方面，克氏論及個體在整體組織中的不可分割性，每一個體被組織在共同的核心思想，每一個別行動均致力於整體目標之達成。克氏此種非線性的觀念，完全符合浪漫主義時期（Romantic era）對自然的科學處理方法，Herder、Goethe 等等浪漫主義者也都師從那些學者。實際上，克氏以相互依賴或交互作用的陳述，在他的著作中展示了十九上半世紀浪漫主義的世界觀的核心概念—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Beyerchen, 2007: 55-56）。

以上論者作出中間過渡定位的推論依據，大致是從：理念追求的物理性或有機性屬性；科學或懷疑論的傾向；對幾何等物理因素或精神等抽象因素的取捨；受到德國唯心主義或浪漫主義影響的關

係；私人交往過從關係；對政治與精神因素或天才概念的重視；科學與藝術因素的強調。以上的論點，除了 Aron 提及戰爭藝術不可能縮減為一個成本與報酬計算的克氏觀點，Beyerchen 提及浪漫主義對自然科學處理的世界觀此項觀點，但均未進一步詮釋。其他論點，則均非依據 Berlin 的分界指標作出定位。

然而，以上大致依據時間序列的不同陳述，分別是從克氏的時代際遇與矛盾心理、典型知識份子的教養歷程、時代背景下的知識趨勢發展、克氏尋求中間地帶的意圖，以及《戰爭論》文本所隱含的整合概念，不同學者均依其各自的論述角度，作出對克氏思想的定位。這些內容所述雖有不同，但畢竟直接或間接的都隱含著一個普遍性理論能否或如何建立的問題。這不同於 Berlin 明確的對反啓蒙的哲學意義界定，但是卻可以從更廣泛的視野理解並求證克氏的真正思想屬性。

六、辨正與分析

本節綜整前節的分析，首先將針對論者在定位克氏啓蒙或反啓蒙思想屬性的謬誤之原因，提出幾點看法。其次，則對克氏應有的定位，作出儘量客觀的結論。

(一) 定位謬誤之原因

無論定位克氏為啓蒙或反啓蒙不同思想的推論上，大多呈現了一種現象，即他們沒有正確的認知那個時代的哲士，也更經常誤解後續對克氏思想的闡釋者。他們多從直覺的溯因途徑，以及並未遵守因果關係的充要條件而作出推論。很可能的原因是，他們多數並

非從專業哲學以及哲學史的嚴謹立場進行推論。以下對這些產生歧見的原因，歸納幾點本文的看法：

第一、某些論者對 Fichte、Hegel，甚至對 Kant 的浪漫主義或反啓蒙思想屬性的定位，仍然混淆不明。

Berlin對這些包括Kant在內的思想定位，有著明確的陳述。他在1956出版的書中指出，Hamann、Herder，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包括Montesquieu、Hume，開始了這場注定要日益壯大的對理性主義的反叛，但後者還停留在孤立的懷疑之中（Berlin, 1957: 28）。但是，即使Montesquieu、Hume與Kant這些有所偏離的人，雖然對啓蒙科學主義這種方法有所懷疑和限制，卻是充分而堅定地接受了它（Berlin, 1973: 109）。尤其令Berlin感到啼笑皆非的是，一生嚴謹而毫無浪漫氣息，畢生痛恨切形式的空想，且有著深刻的理性主義思想的Kant，他的道德學說觀點卻被誇大和歪曲，於是也部分地變成了此種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之父（Berlin, 1973: 107）。

Gray也認為，Hume和Kant這兩位啓蒙運動的高級重要的人物不知不覺地通過浪漫主義運動對反啓蒙運動貢獻了力量。然而，被浪漫主義所襲用存留下來的是Kant關於人類意志的自主性以及事情本身不可知的觀點，而Kant的理性主義則被拋棄了（格雷，1999：125-145）。同樣的，Hegel也嚴厲批判過當時的浪漫主義者，是「放棄對於啓蒙的進一步認識與瞭解，並且只是單面向的、完全地否定啓蒙運動。」（何明修，1997：58），即使從最表面的意義來看，Hegel也並非反啓蒙思想家（Lilla, 2003: 7）。

事實上，德國古典哲學基本上都接受了啓蒙運動對理性宇宙的信仰，對反啓蒙的浪漫情懷有所收斂，最終揚棄、超越了浪漫主義。Kant、Hegel 更是試圖調和啓蒙運動與浪漫主義運動的矛盾，在更

高層次上實現了啓蒙理性的原則（宋友文，2012：55-61）。相對而言，「德國浪漫主義大師，主要為 Novalis 與 Schlegel，為啓蒙理性主義的反抗」（王曾才，1990：69-70）。

第二、某些論者對 Howard 以及 Paret 等權威性著作，作出不正確的理解與推論。

前述，本文將 Howard 歸類為對克氏的反啓蒙定位者，主要是因為 Howard 將公認為反啓蒙的 Berenhorst，與克氏兩人均歸類為 Lloyd 嫡傳的一支，與另一支公認為啓蒙派的 Bülow、Jomini 持完全相反的觀點。同時，Howard 又指稱克氏對意志力的強調與浪漫主義相吻合。這兩項理由使他的說法很自然的將導致後人對克氏為反啓蒙的推論，鈕先鍾的推論即為一例。事實上，Howard 的陳述未合邏輯，或至少不夠嚴謹。因為，他既然認為典型的反對啓蒙理性主義的 de Saxe 元帥，與 Lloyd 處於對立的地位，代表著那個世代的兩種思想，就很難將同樣持反啓蒙觀點的 Berenhorst 解釋為 Lloyd 的弟子，更不宜視其為傳人之一。另一方面，克氏也不若前兩位對啓蒙理性的全然否定，甚至很明確的是與 Lloyd 相類似，應該被歸類為 Lloyd 啓蒙思想的真傳。若依 Strachan 對啓蒙思想定位的分界：「...將 Geist 譯為“spirit”，是將克氏定位為浪漫主義；若像 Howard 與 Paret 傾向於譯為“intellect”，是將克氏明確定位在啓蒙理性推論的系絡之中」（Strachan, 2007: 40），則 Paret 與 Howard 至少被 Strachan 認為他們是將克氏定位為啓蒙派。此外，Howard 在其著作中從未提及啓蒙與反啓蒙的用詞，至於浪漫主義一詞，亦僅用此一處，我們難以判斷他對浪漫主義一詞的意義。因此，Howard 的簡略陳述可能已經導致了後人的誤解。

論者對 Paret 著作的不當或過度推論，則更為明顯。Lebow（2003:

177) 引用Paret (1985: 149-150) 的著作稱：「...克勞塞維茨經常被描述為一個全心擁抱反啓蒙的人」。Cooper (2007: 80) 同樣引用該頁，認為：「克氏對戰爭的研究取向也類似Kant與Hegel，Paret將克氏歸類為反啓蒙陣營，可能是持平的說法」。以及，前述鈕先鍾引用Paret (1985: 166) 的著作，作出克氏為「反啓明學派的開山大師」的推論（鈕先鍾，1995：251）。

事實上，Paret從未將克氏明確的指稱為浪漫主義或反啓蒙者。Paret的說法是：Scharnhorst對克氏採取的雖然是「非啓蒙式」的教導，但是，克氏早年強調天才的觀念，卻非Scharnhorst的功勞，這隱含了他們之間某些特定的分歧。Scharnhorst遠不及他的學生對「天才」概念的創造能力，且較少關注於這項概念（Paret, 1985: 166）。更明顯的證據是，Paret在其著作中係以「德國唯心主義」（German idealism）來形容克氏的思想脈絡。⁶ 他清晰的指出，克氏早期著作受到啓蒙哲學家以及德國唯心主義者Kant、Fichte、Hegel等人的影響（Paret, 1985:84）。但是，這種強調個人作用的唯心主義，卻引起更多後人對唯心主義某種程度的誤解與混淆，甚至導致與浪漫主義思想的關聯。此種誤導情形，留作下一點說明。

第三、某些論者使用「德國浪漫派唯心主義」（German Romantic Idealism）的名詞概念，與唯心主義或浪漫主義造成混淆。

Paret使用「德國唯心主義」的概念，是一種正規的哲學用語。按照 Georg G. Iggers (1926-) 的說法，個體觀念的人道理想與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這兩種思想促進了歷史主義學說的修正和完成，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堅持啓蒙運動理想（伊格爾斯，2006：6、46）。

6. Paret 在描述克氏身處時代知識的文化脈絡背景，全書有 15 處使用 “German idealism” 的名詞，但亦有一處使用「浪漫派唯心主義」（Romantic idealism）的用法。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Max Horkheimer (1895-1973) 指出，Kant 的唯心主義，受到洛克與盧梭的影響。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Fichte 等人則提供了這種唯心主義的一種理念，藉由著作與在耶那 (Jena) 的演講，鼓舞了 1790 年代中期許多年輕的德國浪漫主義者 (Seidman, 1983: 58)。

Peter Thorslev 即以「德國浪漫派唯心主義」一詞來陳述當時的思想脈絡。他認為，Kant 理論給予了「浪漫派唯心主義」者論述的依據。在後 Kant 時期，作為 Kant 追隨者的那些德國唯心主義者，例如 Fichte、Schelling，以及 Hegel 諸人，他們並不若 Kant 一樣予 Newton 科學一定的空間。雖然像 Kant 到 Hegel 這些唯心主義者的各種論點多相矛盾且毫無體系，但浪漫主義者仍然能從「德國浪漫派唯心主義」的基本前提假設中獲得助益 (Thorslev, 2003: 79-81)。

Barbel Frischmann (1960-) 對這些不易分辨的概念作出了詳細的解釋。她指出，德國唯心主義的派別很多，其間有許多分享的前提，也有許多必要的差異。Fichte 為德國唯心主義者，Schlegel 則轉型成為早期德國「浪漫派唯心主義」(Early Romantic Idealism)，兩者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以往在唯心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有著清楚的區別，但是早期浪漫派的人都是將自己描述與理解為唯心主義者。Frischmann 指出，Fichte 對早期浪漫派哲學 (Early Romantic philosophy) 影響深刻。早期德國「浪漫派唯心主義」者 Schlegel，以及 Novalis、Schelling 等，他們的論點，不能形成任何有系統形式的觀念 (Frischmann, 2010: 343-348)。Frischmann 認為，德國唯心主義可以分割為幾個不同區塊：Kant 與 Fichte 的先驗、Jacobi 的宗教、Schlegel、Novalis 的早期浪漫思想、Schelling 與 Hegel 的絕對等等。簡言之，先驗唯心主義試圖以意識的先驗結構，來掌握無限

開闊的知識領域；絕對（純粹）唯心主義預設了一個存在的整體有序的原則；早期「浪漫派唯心主義」則主張放棄對普遍性、最終基本原則方案的追求（Frischmann, 2010: 353-354）。在 Frischmann 這裡，相對於 Kant、Fichte、Hegel 這些有些微差距的唯心主義者而言，以 Schlegel、Novalis 為代表的「德國浪漫派唯心主義」，才是 Berlin 所稱主張放棄對普遍性原則追求的浪漫主義思想。

第四，有些論者從當時代哲士之間的交往過從關係，來推論他們的思想定位。此種外在形狀的粗淺觀察，自然會導致對實際本質的誤解。

某些論者引用 Paret 以及其他著作的證據，推論克氏與 Schlegel 等浪漫主義作家相識（Cooper, 2007: 80-81），熟稔那些反啓蒙者的著作，且與他們聯繫過，甚至也與 Hegel 在友人家中打過紙牌。因此在很多方面，反啓蒙的觀念影響了克氏的思想與理論假設（Lebow, 2003: 177-178）。

然而，亦有一種特殊情形被描述。Alan Charles Kors（1943-）的著作指陳：「1769年，Bergier神父（Abbé Nicolas Sylvestre Bergier）抵達巴黎，並經常性的進出無神論者 Diderot 以及 Baron d'Holbach（1723-1789）的沙龍，以尋求在 1771 年的著作中駁斥他們的靈感」（Kors, 1976: 113-117）。實際上，啓蒙與反啓蒙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18 世紀後半期，沙龍（salon）成爲了哲學家們通過辯論和交換觀點的活動空間。許多反啓蒙者不僅鑽研神學同時對啓蒙著作也非常熟悉。這些都不妨礙他們成爲反啓蒙者。相反，對哲學家的文體和思想的熟悉，使他們可以更好地反駁對手。不乏王室成員和貴族將啓蒙視爲一種時髦的風氣，對啓蒙著作的閱讀，並不代表同意其思想，也不意味著放棄傳統的基督教信仰（張

智，2008：81-91）。

由此觀之，在十八世紀啓蒙與反啓蒙運動熱烈進行的年代，僅從過從關係的單一推論，尚不能構成正確的結論。

以上，將克氏定位於兼具啓蒙與反啓蒙屬性的觀點，似乎廣被接受，亦具論證的周延性。然而，無論哪一種定位的結論，雖然也有從建構普遍性理論的觀點切入，直覺的認為克氏理論建構的可欲性，但絕大多數論者並非完全依據 Berlin 所稱中心信條與核心觀點作出推論。

(二)、克氏思想屬性的正確定位

其次，至於克氏思想的定位，究竟如何？就《戰爭論》的內容所述，克氏自稱，其建構理論的意義，係強調將精神因素置於理論範圍之內。其要領即為在擬訂物質因素的規則時，必須考量精神因素在其中的扮演角色。而克氏所討論的大多數問題都是由相同份量的物質與精神的因果關係所組成（Clausewitz, 1993: 217）。然而，克氏自承並沒有達到此種理論建構的目標，也沒有考慮「系統或形式化的連接」（system or formal connection）（Clausewitz, 1993: 71）。另一方面，從本文第五節，包括Aron等人所稱的中間過渡思想論點來看，克氏雖然批判啓蒙的科學理性，但也仍然保有對啓蒙的信心，肯定有一個可以重建知識大廈的科學規律。他們的論證已然非常強固，足以說明克氏乃居於啓蒙理性主義改革者的立場，但仍然堅持存在著普遍原理原則的信念。一如Berlin所描述的，從Montesquieu、Voltaire，到Kant、Hegel一樣，是對啓蒙的改革者。本文欲強調的是，克氏在啓蒙運動中所堅持的立場，正足以說明或預見其理論建構的可欲性，而絕非終究不能完成的「未完成的」著作。

探究克氏思想定位的意義，可以一個例子做爲說明：鈕先鍾稱，反啓蒙的「基本觀念又仍然繼續維持不變，那也就是對普遍戰爭理論的尋求」（鈕先鍾，1995：173）。僅就這一句話而言，它是錯誤的陳述，因爲反啓蒙思想乃主張放棄對普遍原理原則的追求。如果從上下文的脈絡來看，鈕先鍾指的是克氏對普遍理論的一貫追求，則自然無誤。問題是，依據 Berlin 的分界，克氏這樣的思想屬性則絕非真正的「反啓蒙」，而是一種對啓蒙的改革但仍堅持啓蒙的中心原則與核心觀點。易言之，對克氏的啓蒙屬性之定位，就決定了《戰爭論》理論建構的可欲性必然存在。反之，對啓蒙與反啓蒙分界的誤解，適足以誤導後續研究者對克氏未竟之業可以致力解決的信念。

七、結論：《戰爭論》理論建構的可能方向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釐清那些混淆不清甚至某些錯誤的推論，以澄清理論研究工作的起點。就此意義而言，前節「二、克氏思想屬性的正確定位」，即可以作爲最後之結論，無須再作贅言。然而，僅止於此，則對一項研究工作，似乎缺乏具體的內涵，其對戰爭理論的建構，更是毫無助益。更何況，克氏在《戰爭論》中已然不自覺的提出了關鍵性的提示，而後人亦未予明顯的察覺，殊屬可惜。因此，本節仍欲提出一些延伸的思考，忝充作爲未竟理論的未來可能建構方向，作爲本文最後的結論。

前述論者絕大部份並非從 Berlin 的觀點作出對克氏的定位，其間差異所導致的後果，主要是並非強調精神與物理兩種因素如何調和融入理論，以能提出某些包含兩者的抽象概念作爲理論的骨架。

即便如此，從上個世紀最後二十年以來，Gallie、Aron、Gat 等人，也仍然能夠提出了某些融合精神與物理兩種因素意義的觀點，分別揭示了克氏建構理論的未竟目標，應該如何著手。這些論點，足以作為一種啓發性的思考。

Aron 認為，要從整體來理解克氏建構理論的問題（Aron, 1983: 232）。Aron 提及「絕對戰爭」的概念，能夠成為饒有意義的句子。例如：「一般參考點」（“a point of general reference”）、「所有恐懼與希望的最初測量」（“the original measure of all our hopes and fears”）、「必須總是能夠做為基礎的基本見解」（“a fundamental notion that must always provide the foundation”）。這些，為克氏意欲為他的思想尋找一個精確的公式化表述的目標，但其最終的結果仍未確定（Aron, 1983: 265）。Aron 指出：當代詮釋者應該不難瞭解克氏的方法。克氏欲處理的問題是：在兩個政治組織集體之間，在時、空擴展中一步步的從對抗到死亡，在理論上的意義。Aron 認為，自然科學的戰略理論，或者是韋伯理念型的觀點，兩者均可給予前述理解的同樣貢獻（Aron, 1972: 605）；克氏採取 Berenhorst 與 Bülow 兩者的中間立場，此項論點看起來是伴隨著矛盾的指導原則（Aron, 1983: 207）。Aron 似乎已經發現到克氏追求理論困境的關鍵方向，從而提出啓發性的一在更高的層次找出關鍵性的統攝概念—例如矛盾這類概念，不過，Aron 也未做進一步的發展。

Gallie 強調克氏理論的建構，應從概念簡化的方向著手。Gallie 指出，1827 年克氏的那項筆記陳述，展現了克氏可以用更簡化的概念名詞為基礎，進行《戰爭論》全部修正的意圖。在 Gallie 看來，那是大有可為的。然而，據經完成修改的第一篇第一章內容看來，Gallie 認為，全然沒有簡化其概念名詞與原則，其所產生的問題是，

在沒有簡化概念的情況下，全書的邏輯連貫，勢將付出很大的成本（Gallie, 1978: 47-48）。Gallie 對重建克氏概念系統的總結是：任何戰爭的計劃與執行，都存在內在的矛盾（Gallie, 1978: 60）。這個觀點，與 Aron 幾乎一致。

Aron 與 Gallie，原創性的提出了克氏理論重建的抽象層次的概念—矛盾關係—具有理論結構所需最基本的抽象概念的意涵。然而，概念或概念間的關係究係如何？卻仍未顯現。

延續前人的研究，Gat 提出另一種處理的途徑。Gat 指出，克氏理論發展工作的核心以及他所遭遇主要的困難，是如何在歷史多樣性的條件下，建立一個包括所有因素而普遍有效的戰爭理論（Gat, 1989: 185, 189），這可能要從實證主義到邏輯實證主義及其後續發展的科學進路，以及著眼於科學與人文科學、歷史與人的內心世界兩者之間的巨大鴻溝，從這兩種途徑作全面的探討（Gat, 1989: 253）。顯然，Gat 的思路是從科學哲學的途徑，在方法論領域的根本性探討，然而這種抱負過於宏大與抽象，他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實踐作為可供參考。但是，這種思考顯然逐漸接近現代理論建構的方法論途徑。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就克氏理論研究的領域，Beyerchen 提出了比矛盾更抽象的原創概念。他自 1989 年開始，陸續提出有關「非線性」概念的一連串著作。⁷「非線性」意指「非直線」的，在非線性

7. "Nonlinear Science and the Unfolding of a New Intellectual Vision," *Paper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Vol. 6 (1988-89): pp. 25-49; "Clausewitz, Nonlinearity 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3 (Winter, 1992), pp. 59-90; "Clausewitz and the Non-Linear Nature of War: Systems of Organized Complexity," in Hew Strachan and Andreas Herberg-Rothe, eds, *Clausewitz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7, pp. 45-56.

系統中，它們違反比例或加法的規則，呈現不成比例的增大或減小。它們可能涉及增強效果的相互作用所影響，而總體效果並非個體相加的結果。相對於簡單的方程式而言，非線性為數學的複雜方程式（Beyerchen, 1992: 59-60）。Beyerchen認為，非線性科學的某些觀念，可以幫助我們領會克氏思想的基本要素（Beyerchen, 2007: 45, 55）。這個概念，具有數學形式的簡潔與美感，自然比單純描述性的矛盾概念更接近抽象表述的理論要求。

更為獨特的是，Edward Luttwak 在獨立於前述研究的位置上，於 1987 年的著作中提出「矛盾邏輯」（paradoxical logic）的概念。他提出支配戰略的矛盾邏輯，截然不同於一般所理解的「線性邏輯」（linear logic）。Eliot A. Cohen 認為 Luttwak 僅僅是以直覺的形式，未經嚴密的論證即於其著作的前言內提出此一假設。而且，全書的論證亦缺乏變數與概念層次的科學客觀分析，故而在理論上的定位仍屬爭議（Cohen, 1987: 56-57）。

然而，Luttwak 畢竟原創性的提出了「矛盾邏輯」的概念與事實陳述。他的論點是：在整個戰略範疇，都遍佈著一種與日常生活經驗大不相同的矛盾邏輯。此種邏輯往往違反常見的線性邏輯，導致對立雙方趨於一致及情勢逆轉（inducing the coming together and reversal of opposites）（Luttwak, 2003: 2）；一旦把時間作為一個動態因素引入，我們便可了解此種邏輯的總體，乃為「對立雙方趨於一致，甚至情勢逆轉」（Luttwak, 2003: 16）。以本文的觀點來看，Luttwak 雖然名之為闡釋戰略的原理，事實乃屬於戰爭理論的最主要部份。最具意義的是，無意中，他已然結合了矛盾與非線性兩個概念，而且作出概念間包含時、空兩個基本物理概念關係的陳述。然而，他就這一方面的抽象陳述或論證太少，他的論述完全置於事

實的解釋，所欠缺的是抽象概念與概念架構之間的「形式化」表述。

Howard 認為，對克氏的思想不應妄加補充，而所期待於他的，也不應超過克氏本人所準備給予的限度（Clausewitz, 1993: 49）。如果遵守 Howard 的「戒律」，則以上的討論顯然是妄自尊大。然而，一直以來對《戰爭論》誤解所引起的普遍不正確引用，適足以形成對克氏理念以及戰爭真理更多的蔑視。另一方面，觀諸克氏的本意，似也不應為 Howard 所言。克氏於其 1830 年「未完成的筆記」指稱：人類的心靈都有一種追求澄清的普遍渴望，與希望置於秩序安排之中的感覺（Clausewitz, 1993: 79-80）。

尤其意義的是，在這項 1830 年筆記的最後一段中，克氏認為他已完成的寫作仍屬正確無誤，然而需要加以蒸餾始能獲致戰爭的理論。因此，克氏列舉了他確信合於事實的一組連貫的「命題」（propositions），使他堅信戰爭理論建構的可欲性。

這組命題卻呈現了理論建構的重要意義。這組克氏依據事實陳述的各項命題之間，呈現明顯的對立與矛盾陳述，是克氏未予進一步整合，但希望有所解答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說，克氏理論建構的可能途徑，至少是將這些列舉的命題最終在抽象概念層次的整合，以某些新的或有系統的概念間關係作出形式化的理論陳述。

參考書目

- Aron, Raymond. 1972. Susan Tenenbaum. trans. "Reason, Passion and Power in the Thought of Clausewitz." *Social Research* 39, 4: 599-621.
- Aron, Raymond. 1983.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
- Barrett, William. 1962.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 Bassford, Christopher. 2007. "The Primacy of Policy and the Trinity in Clausewitz's Mature Thought." in Hew Strachan and Andreas Herberg-Rothe. eds. *Clausewitz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74-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Berlin, Isaiah and Henry Hardy. 2002.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lin, Isaiah. 1957.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Berlin, Isaiah. 1973.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 in Philip P.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00-112*. New York: Scribner's.
- Berlin, Isaiah. 1979. "Nationalism: Past Neglect and Present Power." In Henry Hardy. ed.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420-448*. London, UK.: Hogarth Press.

- Berlin, Isaiah.1990a.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in Henry Hardy. ed.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19. London, UK.: John Murray.
- Berlin, Isaiah.1990b. "Alleged Relativ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Thought." in Henry Hardy. ed.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70-90. London, UK.: John Murray.
- Beyerchen, Alan. 1989. "Nonlinear Science and the Unfolding of a New Intellectual Vision." *Comparative Studies* 6: 25-49.
- Beyerchen, Alan. 1992. "Clausewitz, Nonlinearity, 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3: 59-90.
- Beyerchen, Alan. 2007. "Clausewitz and the Non-Linear Nature of War: Systems of Organized Complexity." in Hew Strachan and Andreas Herberg-Rothe. eds. *Clausewitz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45-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Cassirer, Ernst. 1955. Fritz C.A. Koelln and James P. Pettegrove. trans.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Boston, MA.: Beacon.
- Chapman, John W. 1979. "Review."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 2: 559-560.
- Cohen, Eliot A. 1987. "Books in Review: Paradox in War." *Commentary* 84, 1: 56-57.
- Cooper, Barry. 2007. "Aron's Clausewitz," in Bryan-Paul Frost and Daniel J. Mahoney. eds. *Political Reason in the Age of Ide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Raymond Aron*: 75-104.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Crevelde, Martin van. 1991. *On Future War*. London: Brassey's.
- Echevarria II, Antulio J. 2007. *Clausewitz and Contemporary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eming, Bruce. 2004. "Can Reading Clausewitz Save Us from Future Mistakes?" *Parameters* Spring 2004: 62-76.
- Frischmann, Bärbel. 2010. "Friedrich Schlegel's Transformation of Fichte's Transcendental into an Early Romantic Idealism." in Daniel Breazeale and Tom Rockmore, eds. *Fichte, German Idealism, and Early Romanticism*: 343-355. Amsterdam, Netherlands: Rodopi.
- Gallie, Walter Bryce. 1978. *Philosophers of Peace and War: Kant, Clausewitz, Marx, Engels and Tolsto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rrard, Graeme. 2011. "The war against the Enlighte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10, 2: 277-286.
- Gat, Azar. 1989. *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Clausewitz*.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oward, Michael and Peter Paret. 1993. "Editors's Note." in Clausewitz, Carl von.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trans. 3rd ed. *On War*: xvi-xiii. London: David Campbell Publishers Ltd.
- Howard, Michael. 1970. "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 in Michael Howard,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 21-36. London: Temple Smith.
- Kant, Immanuel. 1996. James Schmidt. tran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James Schmidt. ed. *What is*

- Enlightenment?*: 58-6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ors, Alan Charles. 1976. *D'Holbach's Coterie: An Enlightenment in Par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ebow, Richard Ned. 2003.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lla, Mark. 2003. "What Is Counter-Enlightenment?" in Joseph Mali and Robert Wokler. eds. *Isaiah Berlin's Counter-Enlightenment*: 1-11. Philadelphia, P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Luttwak, Edward N. 2003.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2n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li, Joseph and Robert Wokler. 2003. "Preface." in Joseph Mali and Robert Wokler. eds. *Isaiah Berlin's Counter-Enlightenment*: vii-xi. Philadelphia P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Paret, Peter. 1985. *Clausewitz and the State: The Man, His Theories and His Times*. 2nd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aret, Peter. 1993. "The Genesis of *On War*." in Clausewitz, Carl von.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trans. 3rd ed. *On War*: 3-28. London: David Campbell Publishers Ltd.
- Perimutter, Amos. 1988. "Carl von Clausewitz,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1, 1: 7-19.
- Rasmussen, Mikkel Vedby. 2001. "The Acme of Skill: Clausewitz, Sun Tzu and the 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Dansk: Udenrigspolitisk Institut.

- Robertson, John. 2003. "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Joseph Mali and Robert Wokler. eds. *Isaiah Berlin's Counter-Enlightenment: 73-90*. Philadelphia, P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Saxe, Marshal Maurice de. 1985. Thomas R. Phillips. trans. "My Reveries Upon the Art of War." in Thomas R. Phillips. ed. *Roots of Strategy: 177-300*.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 Seidman, Steven. 1983. *Liber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ernhell, Zeev. 2010. David Maisel. trans. *The Anti-Enlightenment Tra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rachan, Hew. 1983. *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 UK: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 Strachan, Hew. 1992. "Review: 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Clausewitz."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7, 425: 1035-1036.
- Strachan, Hew. 2007. "Clausewitz and the Dialectics of War." in Hew Strachan and Andreas Herberg-Rothe. eds. *Clausewitz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4-4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Thorslev, Peter. 2003. "German Romantic Idealism." in Stuart Curra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ritish Romanticism: 74-9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kler, Robert. 2003. "Isaiah Berlin's Enlightenment and Counter-Enlightenment." in Joseph Mali and Robert Wokler. eds.

Isaiah Berlin's Counter-Enlightenment. Philadelphia, P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王敏、馬德普。2012。〈價值多元論與相對主義：論以賽亞·Berlin對價值多元論的辯護〉。《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7-12。（Wang, Min and De-Pu Ma. 2012. "Value-pluralism and Relativism: On Isaiah Berlins Defending for Value-pluralism."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4: 7-12.
- 王曾才。1990。《西洋近代史》。台北：正中。（Wang, Tseng-Ts' ai. 1990. *Modern History of Western World*. Taipei: Zheng zhongshuju.）
- 卡西爾（Ernst Cassirer）。1988。顧偉銘等譯。《啓蒙哲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Cassirer, Ernst. 1988. Wei-ming Gu, et al. trans.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Jinan: Shandong Renmin.）
- 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2006。彭剛、顧杭譯。《德國的歷史觀》。南京：譯林出版社。（Iggers, Georg G. 2006. Gang Peng, and Hang Gu. tran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Nanjing: Yi Lin Chu Ban She.）
- 何明修。1997。〈Hegel 與啓蒙的辯證〉。《思與言》35，3：39-64。（Ho, Ming-sho. 1997. "Hegel and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 and Words* 35, 3: 39-64.）
- 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1980。鈕先鍾譯。《戰爭論》。台北：軍事譯粹社。（Clausewitz, Carl von. 1980. Xian-Zhong Niu. trans. *On War*. Taipei: Foreign Military Digest.）
- 宋友文。2012。〈「反啓蒙」之濫觴：歷史主義興起的哲學反思〉。《南京社會科學》1：55-61。（Song, Youwen. 2012. *The Beginning*

of Anti-enlightenment: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 1: 55-61.)

- 李華。2012。〈「一與多」思想的傳承：普羅提諾與庫薩關係片論〉。
《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1, 5: 26-34。(Li, Hua. 2012.
“Inheritance of the Theory of “One and Many”: A Brief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otinus and Cusanus.”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1, 5: 26-34.)
- 施密特 (James Schmidt) 編。2005。徐向東、盧華萍譯。《啓蒙運動
與現代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Schmidt, James. ed. 2005.
Xiang Dong Xu, and Hua-Ping Lu. trans.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格雷 (John Gray) 。1999。馬俊峰等譯。《Berlin》。北京：昆侖出
版社。(Gray, John. 1999. Jun Feng Ma, et al. trans. *Isaiah Berlin*.
Beijing: Kunlun Press.)
- 張智。2008。〈略論法國舊制度末期的反啓蒙運動〉。《世界歷史》
6: 81-91。(Zhang, zhì. 2008.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 of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in French.” *World History* 6: 81-91.)
- 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92。吳宗寶譯。〈論 Kant 的「何謂啓蒙」〉。
《當代》76: 22-31。(Foucault, Michel. 1992. Tsung-Pao Wu. trans.
“What is Enlightenment?” *Con-Temporary* 76: 22-31.)
- 鈕先鍾。1995。《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Niu, Xian-Zhong.
1995. *The Western History of Strategic Thinking*.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蓋伊 (Peter Gay) 。1992。江金太譯。〈歐洲啓蒙運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9：269-321。(Gay, Peter. 1992. Chin-Tai Chiang. trans. “The Enlightenment.” *The Journal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9: 269-321.)

蓋伊 (Peter Gay) 。1993。江金太譯。〈歐洲啓蒙運動(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0：89-130。(Gay, Peter. 1993. Chin-Tai Chiang. trans. “The Enlightenment (2).” *The Journal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0: 89-130.)

鄧春梅。2012。〈以賽亞·Berlin 的多元主義自由觀及其困境〉。《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6, 4: 49-53。(Deng, Chun-mei. 2012. “On Isaiah Berlin's Pluralist View of Freedom and Its Theoretical Plight.”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6, 4: 49-53.)

韓曉賀。2012。〈一元、多元與自由：Berlin 價值多元論思想探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 33, 9: 58-59。(Han, Xiao-He. 2012. “The One and the Plurality and the Liberty: Berlin's concept of Value Pluralism.”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 Sci)* 33, 9: 58-59.)

Clausewitz's Military Enlightenment Thought and Desirability of His Unfinished Theory

Li-Ming Lee*

Carl von Clausewitz's *On War* is an "unfinished" work. The reas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is that it was impacted by both Enlightenment and counter-Enlightenment thought in the 18th century. Clausewitz desired to construct a war theory. As far as the methodology of constructing desirability by a universal theory is concerned, could his ultimate goal be completed? This, however, has drawn little attention by researchers. Moreover, researchers are ambiguous or even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over what Clausewitz's idea was. Therefore, a consensus is very difficult to build for further study.

In the case that Clausewitz's thought was based on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 then, in theory, he still could not reconcile a contradiction in his concept to construct a theory. In the case that Clausewitz's thought was influenced by the Enlightenment, then he should blend both the spiritual and the material to ultimately achieve his goal of constructing a universal war theor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larify whether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Taipei.

Clausewitz was an Enlightenment or a counter-Enlightenment thinker, and finally to indicate a desired direction for construction in his theory.

This study adopted Isaiah Berlin's explanation of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 for reference and proceeded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onflicting arguments. In respect to narrative structure, apart from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consciousness, this study begins by stating a line of demarcation between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counter-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to serve as an indicator for analysis. Then, I discuss three possibilities of Clausewitz's thoughts. Finally, this study is summarized by propos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pointing out a proactive thinking direction for constructing Clausewitz's theory.

Keywords: Clausewitz, Enlightenment, counter-Enlightenment, On War